

激流勇进与退避三舍

——曹植与阮籍文学创作之比较

高金生

(南通师范学院 中文系, 江苏 南通 226007)

摘要:曹植与阮籍两位作家在文学创作上有同有异,有相近的处境、相近的风格等,同时也有各自所特有的鲜明的特点。将二人的文学创作情况作一试探性的论述,结合分析后可以概括为:曹植——激流勇进;阮籍——退避三舍。

关键词:曹植;阮籍;文学创作;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697(2004)02-0014-04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第五子,曹丕同母弟,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县)人,封雍丘王、东阿王、陈王,谥号思,故世称陈思王。他的生活和创作可以220年曹丕称帝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曹植“生乎乱,长乎军”,(曹植《陈审举表》)他的童年时代是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度过的,长大以后又多次跟随曹操出征。在特定的生活和时代背景以及曹操的影响下,他树立了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欲“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曹植《与杨祖德书》)这样便为他的创作上的慷慨的风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曹植自幼就表现出较高的文学才能,“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三国志·陈思王传》)在前期,他以才华横溢而深得曹操的常识和宠爱,几乎立为太子,但是到了后期,形势巨变。公元220年曹操去世,此后,曹丕及其子曹叡相继为帝,他们与曹植有很深的矛盾,在政治上对他深怀猜忌,横加压抑与迫害。虽然曹植也拥有王侯显贵的身份。但实际上却成为变相的囚徒。前期那宏远的志向无法得到实现。因而终于在愤懑中结束了他四十岁的生命。他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诗品》称之为“建安之杰”,其作品中很多,传世的有诗八十多首,辞赋与散文共有四十余篇。他前期的作品大都描写在邺城的安逸生活和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而后期的作品则充满了愤懑的情绪,往往通过比兴寄托的方法来抒写受到压抑的不平之感和要求个人自由解脱的心情,他的诗歌在学习乐府民歌的基础上加以提高,语言精炼,词采华茂,对五言诗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阮籍(210-263),字嗣宗,“竹林七贤”之一,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尉氏县)人,曾经担任步兵校尉之职务,因此世称“阮步兵”。他生活在从魏到晋的过渡时期,这时候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异常尖锐、残酷。曹魏统治四十六年(220-265)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魏文帝(220-227)明帝(227-240)在位时为前期,齐王曹芳(240-254)高贵乡公曹髦(254-260)元帝曹芳(260-265)在位时为后期,后期君主势力削弱,权贵司马氏独揽大权,“王纲解纽,天下大乱,英雄人物趁时而起,作政教,立刑名,建德树声。”(曹植《存问亲戚疏》)到了司马氏265年篡魏建晋后,便实行专制统治,对于不与其合作的文人采取高压政策。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阮籍便纵酒谈玄,远离时事以避祸。对于司马氏的残暴统治,他表面上采取敷衍的态度,实质上却是消极反抗。“阮籍的一生,是在一种巨大的心灵冲突中走过来的。”^{[1]P67}特殊的历史环境在客观上对阮籍的文学创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创作上,阮籍长于五言诗,作品的内容对当时的虚伪礼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抒写了自己抱负无法施展的苦闷心情,也流露了人生无常、全身避害的消极避世情绪。这是特定时代的特定产物。

曹植与阮籍两位作家在文学创作上有同有异:有相近的处境、相近的风格等,同时也有各自所特有的鲜明的特点。本文便以下几个方面对此作一试探性的论述。

一、创作风格、形式上的一脉相承

首先要指出的是曹植和阮籍在创作上都表现出了明显的浪漫主义风格,并且阮籍是对曹植的继承。

“曹植在他的生命后期,常常表述这样的一个信念,即他相信心灵具有巨大的力量,它能够感应而生灵变。游仙诗和《洛神赋》等浪漫主义作品都是这种意识的产物。”^[2]我

- 收稿日期:2003-10-19
- 作者简介:高金生(1972-),江苏盐城人,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文艺学、美学研究。

们先看看《精微篇》中的一段话：

……精微烂金石，至心动神明。杞妻哭死夫，梁山为之倾。子丹西质秦，乌白马角生。邹衍囚燕市，繁霜为夏零……

在此篇中，作家的想象从“杞妻”到“子丹”再到“邹衍”，可以说想象艺术在这里被得到了充分的运用，这几个历史上遭受不幸的人物，都是因为作家的“精微”而使天地感应，使得“梁山为之倾”、“乌白马角生”、“繁霜为夏零”这些本不会发生的事变成了奇迹，而恰恰又与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特点相符合。曹植最著名的一篇浪漫主义作品《洛神赋》，想象极为丰富，作家在对洛神形的一段描绘中，挥洒自如地运用想象简直到了出奇的地步。缤纷多彩的语言多采用四言句式，气势柔缓，形象逼真，对洛神外貌的描写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里是作家浪漫主义方法运用最为成功的一篇作品。

“曹植晚年常常沉浸于类似的美的想象之中，留恋想象中的事物，这心理特点是形成浪漫主义文学的物质基础。通过他的浪漫主义的艺术精神在五言诗的乐府诗中得到了复活，而阮籍正是沿着曹植的创作道路进一步发展了浪漫主义诗歌艺术。”^[2]阮籍的作品《清思赋》就明显受到了曹植《洛神赋》的影响。在作品中，作家凭借丰富的审美经验和艺术想象，而使作品实现了它应有的审美价值。这是运用浪漫主义的结果，阮籍对于浪漫主义创作的贡献可用其一段话来概括：“余以为形之可见，非色之美；音之可闻，非声之善。昔黄帝登仙于荆山之上，振《咸池》于南之冈，鬼神其幽，而夔、牙不闻其章；女娃耀荣于东海之滨，而翩翩于西山之旁，林石之陨从，而瑶台不照其光。”^{[3]P13}

五言诗是一脉相承的另一种创作形式。两位作家在诗歌创作上都运用了五言诗的形式。“阮籍受曹植的影响比较大，曹植的《杂诗》七首，从体制上看，正是阮籍的先导，曹植《杂诗》中那寂静精微的结构、深阔广大的意境，以及运思微妙，章法多变的特点，都被阮籍所吸收，因而成为曹植之后又一位五言诗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诗人。”^[2]曹植的五言诗有《七哀》、《送应氏》、《杂诗》、《送白马王彪》、《白马篇》等。阮籍的五言诗主要有《咏怀诗》八十二首。

二、相似的处境、相同的性格

曹植后期的生活有很大变化。公元222年曹丕称帝。这是曹植生活和创作产生转变的起因。因为前期二人有争做太子的一段经历，而使曹丕对曹植深怀猜忌，在政治上施加压力与迫害，并且杀害了一贯支持曹植的丁仪、丁异兄弟，从而达到了削弱曹植势力的目的，此后曹植便在愤懑中度过了后半生。阮籍与曹植有相似的处境。司马氏即位建晋后，便对知识分子实行罕见的高压政策。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司马氏集团打出了“名教”的旗号，并使之成为遮掩其篡位阴谋的招牌，一边提倡名教中的孝，但另一边又破坏名教中的忠。嵇康就是因为激烈反抗司马氏的残暴统治，痛恨虚伪的“名教”，并给以辛辣的讽刺，而遭到司马氏的杀害。这种压抑、恐怖的气氛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对阮籍产生影响。

曹植和阮籍因而有着相似的处境，即统治集团对他们的压抑，从而导致了反抗成为他们的共同性格。曹丕曾令曹植在七步之内做出一首诗，否则将对他施以刑罚。曹植做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箕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便是历史著名的“七步绝命诗”。在这首诗里作者用“箕”和“豆”作比，地描写了曹丕对他的迫害。与此同时，该诗还从另一方面显示了作者对曹丕对迫害的不满和反抗情绪。《赠白马王彪》是诗人后期的一篇重要的作品。全诗共分七章，用节与节之间的顶真手法并融合描写、议论和抒情，表现了相当丰富的复杂感悟。作品的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作者的情感。不仅在客观上深刻地暴露了统治阶段内部箕豆相煎的残酷，而在更深的层次上表现了他曹丕的愤慨。另外《野田黄雀行》同样表述了他对曹丕的愤怒和反抗：

“高树多悲风，海风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交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鹤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在这篇作品中，诗人以罗家喻迫害者，以雀喻受害者，塑造了一个解救受难的侠义少年形象，寄寓了作者的理想和反抗情绪。

阮籍也有这一类的作品：

“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是时鹞犬中，日月正相望。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羁旅无傍依，俯仰怀哀伤。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斯章。”

诗人把司马氏的暴虐比作“朔风”、“微霜”，把自己的处境比作“羁旅”，表现诗人以司马氏残暴统治的反抗性格。又如《咏怀诗》其三：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霍，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在这首诗中，阮籍把司马氏比作“秋风”、“严霜”，把自己比作“飞霍”、“野草”用“秋风吹飞霍”来表明他对司马氏残酷统治的斥责和反抗。

三、外界的压抑与孤独、苦闷的心情

外界的压抑造成曹植、阮籍二人都有着孤独、苦闷的心情。“曹植后期，完全失去了他曾经生活于其中的文人群体，失去了那些在政治上和文学上都志同道合的朋友。”^[2]这种孤独的心情可以从下面的一段文中看出来：“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唯仆隶，所对唯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拊心，临觴而叹息也。”^[4]如《七哀》，在思妇身上寄托自己的失意和苦闷：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自云宕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可依？”

此外《杂诗·其四》、《吁嗟诗》等也是这一类型的作品。

再看阮籍，“终身履冰，下学上达，皆嗣宗吃紧为一处。”

[5] “长期以来，阮籍即深怀忧生之嗟，意识中充满焦虑。虽然以纵酒经诞韬迹于司马氏之门，但精神上却始终受到外来敌意和内在痛苦的包围。”[6]如他的《咏怀诗·其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风？忧思独伤心。”

篇首的“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一开始便奠定了诗的基调，点明了作者的孤独苦闷的心情，“孤鸿”、“翔鸟”也是这种心情的点缀，而“徘徊将何风？忧思独伤心”则使情感得到了升华。再如《咏怀诗·其十七》：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作者一开始点明了自己的孤独是因为没有“与欢者”而“不见行车马”、“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则是这种心情的衬托，这首诗从头到尾都充满了孤独苦闷、寂寞的心情。所以，王瑶说，“竹林名士的行为，表面上都很任达放荡，自由自在的好像很快乐，实际上则都有这样忧患的心境背景，中心是很苦的。”[7]P40 我们只要细细地品味每一句子、每一个字，便会得到这种感受。

四、对现实生活的不同态度

在现实生活这一点上，曹植诗采取的是如实反映的态度。如《送应氏》中：

“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作者在这首诗中通过“宫室”、“垣墙”、“荆棘”、“荒畴”、“中野”等描写了洛阳在遭受了董卓作乱后的荒凉景象，诗人在这里如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将乱后的洛阳像一幅画似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再如《泰山梁甫行》这首诗：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剧哉连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象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孤兔翔我宇。”

这首诗形象生动地描写了连海人民的贫困生活，他们贫困到了只能“寄身于草野”的程度，而“妻子象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孤兔翔我宇”则是从另一侧面体现了这一点。从这首诗我们明显地看出汉乐府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对他的影响。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曹植这种如实地反映社会现实的创作态度是值得称赞的，在前期他身份王位，无忧无虑；而到了后期这种状态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虽然不失达官显贵的身份，但在实际上却因受到曹丕的政治压抑与迫害而始终不得意，前期那种建功立业的昂扬的声音已渐渐减弱，重重的压迫使他变得孤独、苦闷。因而转向同情劳动人民的一面来，所以就写了这些反映社会现实和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作品。

与曹植相反，阮籍对客观现实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阮籍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崇尚玄学，而“玄学家的最高境界是‘神’，它是一种超现实性的行为，不带有现实行为的具体形式。这种境界就称为‘玄’，它是心灵上的一种超越，而没有具体的物质性的内容。”[2]而超现实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对现实的否定。这与采取肯定现实态度的建安文学是截然相反的，与曹植相比也很不同。“由于外界的高压和他自己名高于世的特殊地位，阮籍在现实中没能逾越宏罗巨网，达到身心的自由。”[6]其内心的压抑痛苦则转化为对现实美的否定上来。他的《咏怀诗》从诗歌形象中所体现的审美取向来看，具有强烈的否定现实美，并追求超现实美的倾向。如：“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其十八）“幽美不可佩，未草为谁荣”（其四十五）“清露为凝霜，华草成蒿莱”（其五十）“墓前荧荧者，木槿耀朱花”、“荣好未终朝，连颺陨其葩”（其八十二）等等，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历来被赞美、肯定的“桃花”、“朱草”、“清露”、“华草”、“木槿”等在阮籍这里却成了被怀疑、被否定和被讽刺的对象。这种否定态度是由他的不满于现实的情绪所决定的。阮籍所追求的美“并没有客观的形式，作者只能通过象征的手法来表现它，类似于庄周的寓言。《咏怀诗》的浪漫意境，从根本上说，正是追求超现实美理想的产物。”[2]由此“达到了自然调节来自现实不得志等的心理失衡，得到精神的安抚和相对的心灵安静，实现对现实的暂时超越的效应。”[8]P35 其中《西方有佳人》、《东南有射山》、《若木耀西海》、《炎炎延万里》、《十日山谷》、《危冠切浮云》、《昔有神仙士》、《林中有奇鸟》等篇尤其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否定性思维。他之所以有这种创作态度，是由于现实矛盾的刺激，使他得到了一种成熟的理性与情感相结合的批判精神。这种否定性的创作态度是阮籍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

五、慷慨宏大与消极避世

曹植前期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过着舒适的贵公子生活，但他也还颇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当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后，他的政治雄心便是西灭“违命之蜀”，东灭“不臣之吴”，“混同宇内，以致太和。”（曹植《求自试表》）他的诗歌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表现其慷慨壮志，如《薤露篇》说：“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在著名的《白马篇》中，描写了一个边塞游侠儿慷慨赴难和奋不顾身的英勇行为。这位游侠儿就是作者本身。诗中的“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生动形象地将游侠儿的英姿展现在读者面前，并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作者慷慨的激情在篇末得到的升华，游侠儿甘愿“捐躯赴难，视死如归”。连父母、妻子都顾不上了，由此可以看出作者意志的宏大。

再看其《杂诗·其五》：

“仆夫早敢驾，吾行将远游。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在这首诗里作者点明了他远游的目的地是“吴国”，他

无心“闲居”，却“甘心赴国忧”，可惜的是“无方舟”，也没有支持他的人。“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则衬托了这种氛围，作者此刻的心情是慷慨与悲凉皆有之。此外，《杂诗》其六也属于这一类型的作品。我们还应当明白这一点：那就是后期，尽管曹植仍不失慷慨宏大的意志，但这种壮志却受到了无端的压抑而无法实现，作者也因此而变得孤独、苦闷和愤激。在意志上，阮籍与曹植不同，他采取的是消极避世的态度。

阮籍处于魏晋易代之际，统治阶级内部的残酷斗争，不仅使他的抱负无法得到施展，他自身的安全也没有保障。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他开始纵酒谈玄，终日饮酒昏酣，遗落世事，企图用酒将自己与外界完全隔绝。这种避祸的情绪是客观条件决定的，是政治影响的结果。在“嘉树下成蹊”一首诗中诗人通过自然景物由繁华到憔悴的过程，形象地提示了曹魏政权的由盛到衰，同时也表现了自己生命难保的忧惧心情。“一日复一夕”一诗更表现了诗人处于这一种险恶环境中“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的战战兢兢的心理。《咏怀诗》的不少作品表现了作者意志消沉、畏祸避世的消极思想，阮籍处于司马氏集团的高压政策之下，虽然满腹愤愤不平，但却不能直抒胸臆，在艺术表现上多采用比兴手法，或用自然事物象征，或用神话游仙暗示，都是言此意彼，曲折隐晦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的这种创作方式显然是受到消极避世观的影响，是时代的产物。

上面对曹植、阮籍二人文学创作情况的分析可以概括为：曹植——激流勇进；阮籍——退避三舍。

总之，曹植与阮籍都是魏晋时代的诗人，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学创作风格，都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后来作家树立了楷模。但是他们又由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原因而难免存在着一些局限性和消极的成份，对此我们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加以分析，而不能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曹植与阮籍二人有一个科学的和健全的认识，也才能对他们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参考文献：

- [1]张喜贵.终身履薄冰 谁知我心焦——阮籍的生存处境探析[J].江南大学学报. 2003,(3).
- [2]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68-208.
- [3](魏)阮籍.阮籍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4]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570-571.
- [5]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6]景蜀慧.《咏怀诗》所见阮籍政治情感及思想历程[J].社会科学,2001,(1):138-140.
- [7]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8]许建良.试论阮籍的理想一格[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2).

Torrent Brave with Try Best to Avoid ——CAO ZHI with RUAN Ji the Comparison of Literature Creation

GAO Jin-sheng

(Dept. of Chinese, NanTong Teacher's college, NanTong 226007, China)

Abstract: CAO ZHI with RUAN Ji two writers in literature creation on have with discrepant, there are similar situation and similar style etc., at the same time, also have the peculiar bright characteristic of place. Paper draft for will the literature creation condition of 2 persons make the exposition with trial one, after combining analysis can be briefly: CAO ZHI ——torrent brave; RUAN Ji ——Try best to avoid.

Key words: CAO ZHI ; RUAN Ji ; literature creation ; comparison